

中共對西藏獨立態度之研究

沈 赫 周

(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摘 要

中共與達賴喇嘛在「西藏獨立」與「西藏地位」問題上，兩方的互動與未來關係之發展，究竟應該如何解讀、分析、預測，學者專家與新聞媒體莫不見仁見智，議論紛紛。

事實上，「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不談獨立」等的態度，不僅是一九五〇到一九八〇年的中共政權態度，時至今日，中共仍持此立場，迄今猶持續不變。

嚴格而言，中共政權對「西藏獨立」或「西藏地位」的態度從未改變過，不過對於西藏的政策及處理西藏問題的態度，則在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出現了轉變。易言之，在處理西藏問題上也轉趨靈活而較有彈性。

值得觀察的是，八〇年代末至九〇年代以來，達賴喇嘛在公開的說詞上開始轉變為「西藏高度自治」或「西藏人權」，而不再尋求「西藏獨立」。其背景何在？這種口號是否符合實際？達賴喇嘛在國際舞台上的公開主張或建議，其理論根據是什麼？

再者，中共如何看待此態度？此外，針對達賴在國際上的宣傳，中共是如何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利用其影響力作反制？其效果如何？為何有該效果的產生？

本文的目的在於對北京、台灣、第三世界學者專家所提出的各種觀點與理論，從文獻探討上以多元化的角度來觀察本文主題之不同視野，並詳加闡釋中共與達賴喇嘛互動之間兩者態度與策略上轉趨靈活彈性的因素。換句話說，雙方為何採取與從前不同的路線？其背景與過去有何不同？並且，本文亦將指出中共對「西藏地位」的立場上為何其看法與精神是始終一貫的。

關鍵詞：中共政權、達賴喇嘛、西藏獨立、西藏地位、西藏自治

* * *

一、緣 起

在當今世界上，民族問題頗為常見，只是問題的輕重、矛盾的大小有所不同。這些問題和矛盾的表現是否突出和尖銳，主要看政府對民族問題的處理是否公正和



得當。

據統計，近半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地先後爆發了四十多個熱點問題，其中因民族問題而引起的地區衝突和局部戰爭竟占70%以上^①。在許多的民族問題中，最醒目的一個課題，就是所謂「藏族的獨立建國」。如一般所見，此議題為西方許多知名人士熱烈討論，另一方面，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獎後更增加視聽效果。

顯然，當代中國大陸近二十年來經濟突飛猛進，但另一方面，統獨爭議已使兩岸變成全球新的火藥庫；另有國內外學界與國際輿論預言，主張非暴力的達賴喇嘛（Tenzin Gyatso）死後，西藏獨立運動將日趨激進；此外，新疆的伊斯蘭分離活動再度活躍也引起學界注意，爭論頗多。

一九八〇年以來「西藏問題」的緣起無論在國內外學術圈早已引起學者相當廣泛的討論，同時也累積了許多極具價值的理論性文獻和實證材料。學者們各種不同層面的研究（政治、宗教、經濟、文化等），著實提供了吾人瞭解西藏獨立爭議與前途理論模式的素材。

目前歸納學界對西藏問題的研究而言，普遍引發熱烈討論的議題主要集中在：1. 在中藏歷史關係中如何界定西藏地位。2. 中共北京政府的對藏政策（本土西藏自治區）如何變遷。3. 北京政府與在印度流亡的西藏政府（海外西藏）關係為何。4. 西藏將來如何選擇自己的路—「獨立」或「高度自治」等。諸如此類的疑問和議題，在當代西藏研究的相關領域引起學術界許多爭議，並引發不同的解釋觀點。

「西藏獨立」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尤其處在今日的複雜情勢，雖然以專題方式來討論此一問題，或許仍無法獲得正確的結論。

我們可能聽過這些名詞：價值中立（value free）、客觀（objective）、以及無偏誤（unbiased）。換句話說，我們在主張或探討某特定事實（現象）的時候，必須堅持價值中立、無偏誤、與客觀的態度。因為社會科學必須去除偏見，接受自由與公開討論的指導。

平心而言，筆者身為韓國人，因受到韓國教育環境的限制，有關西藏方面的片面知識或消息，幾乎僅能透過新聞媒體或報紙取得。

事實上，任何國家或地區之新聞媒體或報紙的可信度也有待商榷。過去吾人研究西藏問題，常缺乏較客觀的事實分析方法。當然，我們所看到的事實、現象及資料分析，並非能夠完全描述整個真實世界，吾人以爲西藏問題亦是如此。

本文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二個階段，第一階段（一九五〇年～一九八〇年代）：一九五一年共產黨軍隊進藏以後，西藏更是完全被遮蔽在鐵幕之後。此時期中共領導人物如毛澤東和鄧小平以及胡耀邦等均針對達賴喇嘛要求進行有條件性的談判。換句話說，此時期中共政府對達賴喇嘛採取較為彈性的態度和要求。其基本原則只有一條，即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②。除了「西藏獨立」不能談，其他問題都可以談，

註① 葛公尚，當代政治與民族問題（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二～三。

註② 一九九七年後才將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也列在前提條件之一。



此將於下節中論述。

第二階段（一九八九年～二〇〇二年）：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達賴喇嘛立場之變化特徵即強調「西藏人權」之口號。追溯其原因，一九八九年三月，西藏拉薩發生動亂，中共在三月七日宣布戒嚴。另外在北京從年初就發生學生的民主運動，結果引發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在此一氣氛之下，西方世界對中共鎮壓民主運動行徑的震驚和無奈是可以想見的。個人以為西方國家為了表示對「中國」的「懲罰」和加強影響西藏局勢，因此將一九八九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達賴喇嘛。

然而就中共而言，中共對西藏的控制是既定事實，並且獲得各國的承認，其地位處於強勢，自不願意與達賴在平等的基礎上來討論西藏地位問題。在中共來說，西藏問題是內政問題，其主權歸屬從不構成問題。如與達賴以平等的基礎來談，則無異使問題國際化，對統治西藏之合法性作自我的否定。中共願與達賴談判的內容，不過是達賴回歸大陸的條件，而不是西藏的地位問題。

每一種社會現象皆持續進行中，加上吾人亦是置身於時代潮流中，欲保持客觀的眼光，並不容易。因此，本文將國內外學者提出的不同解釋和觀點、不同的討論焦點作歸納性的回顧與整理，企圖從中釐清當前「西藏獨立」其實質之地位，最後則提出吾人對上述爭議、理論的反省與檢討，但不敢妄作論斷，只期望能使讀者在今後討論此一課題時，有不同的思考視野。

二、文獻檢閱

學界對於「西藏地位」或「西藏獨立」研究上，其解釋的角度與焦點，集中在三方面。首先，歷史之解釋立場。其次，以國際法的角度為衡量。再次，國際關係的地位。大致歸納如下：

首先，歷史的解釋立場。一九九一年美國人梅·戈爾斯坦（M. Goldstein）出版了**西藏現代史（1931～1951）—喇嘛王國的覆滅**。

作者一九八六年以後才多次旅遊西藏，深入牧區，實地考察。其對於西藏牧區情況自有深入研究。書中引用了許多民謠，以民間口碑的形式加以敘述西藏的歷史和某些事件的近程與背景，並帶著批評諷刺。

作者認為西藏與中國的關係是「供施」（mchodyon）關係，即是說西藏與中國王朝之間是宗教徒與世俗施主之間的一種象徵性關係，mchodyon 是 mchod 和 yon bdag 兩個字的縮寫，前者指的是「值得供奉、祭祀的對象」（如喇嘛，護法神），後者則是指「施捨衣食財務的主人」（施主）。因此，對西藏人來說，達賴喇嘛和滿清皇帝之間，是宗教師和世俗施主的關係，並非君臣關係。

自歷史關係的解讀而言，作者提醒我們，有關中藏歷史關係論述經常忽略的地方，即是思考立場的問題。如一九五一年中共入藏後，舊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受到中共嚴厲的批判，中共將西藏描繪為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農奴的社會，數百年來受到包括達賴喇嘛及其政府、寺院與貴族三大領主的欺壓。在農奴社會的宣傳後，中共



再以「解放軍」的形象出現，這樣可以獲得治藏的正當性。五十年來，中國政府從解放農奴到西藏的現代化，奠立中共對外宣揚的輝煌治績，這中間有的固然是事實，有的卻是宣傳手法。然而作者（梅·戈爾斯坦）認為中共將舊西藏形容為「農奴」社會，但舊西藏時代其實並沒有農奴或是奴隸這樣的社會階層，「農奴」一辭純粹由中共定義後產生。西藏舊社會實施土地封建制，土地均歸政府所有，政府把土地分給貴族、寺院，領主再將土地分給一般農民，農民向領主支差並向政府繳稅後，也可獲得土地，並非一無所有。而且，按照中共說法，農奴比例為百分之九十五，換言之，只要非三大領主便是農奴，但這樣的定義與事實不符。農奴為依附土地而來，西藏有廣大農牧階層，牧區的牧民不需要土地，就不應該是農奴，但按照中共的計算都一併算在內^③。

然而，此論點頗值得懷疑，據學術界的觀察，由田野研究及歷史文獻來看，過去西藏農奴制度的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

北京學者楊公素先生針對喇嘛王國的覆滅一書，提出不同意見。首先，討論西藏民族的歷史，尤其是近現代史，不可能脫離整個中國的大環境，不可能游離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的背景。

楊公素先生認為，就梅·戈爾斯坦教授作為人類學家，他十分注意民族間的差異性，但卻不太注意民族的同一性。他未能把西藏歷史放到苦難深重的中國近代史去考察。因此，其某些解釋和論斷就難以理解。

其次，針對「喇嘛國家」（Lamaist State），這個名稱是不對的，state 具有國家政治性很強的意義。依照現代政治學的概念，國家除了有人民、定居的土地及必須有政府外，最重要的是必須有一個主權政府。楊公素強調道：「西藏有喇嘛。那是對藏傳佛教高僧的一種尊稱，並不是所有出家人都是喇嘛，人們把西藏各寺廟的僧人統稱喇嘛，那是世俗人的隨意叫法」。^④但把西藏稱為喇嘛國家，卻是從本書作者開始的。過去寫西藏的書籍，特別是一些寫西藏歷史專著的外國人，有的可能在書中稱西藏是一個國家。

學界大都同意：在描述中藏關係時，西方學者中的美國學者各有獨特的見解，即是由於歷史之解釋和思考角度之不同^⑤。更進一步言，美國西藏專家學者否定西藏屬

註③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9-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 46.

註④ 楊公素，*當代中國外交理論與實踐（1949~2001）*（北京：勵志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頁三五八~三五九。

註⑤ 在探討學界討論西藏問題時，中、西之間經常看到一系列有關觀念的衝突。學者謝劍一篇文章「自決抑整合：中、西對西藏問題觀念的衝突」值得參閱。本文主旨：首先作者批駁了西方在西藏問題上認為華人具有「原罪論」的說法，強調必須把中共政策失誤所導致的政治問題，和族群及文化問題分開來看待。其次，作者列舉了一系列在西藏問題上中、西間概念的衝突，包括「中國侵略西藏」與「中國對西藏具有主權」、「單元民族國家」與「多元統一帝國」、「民族自決」與「整體意識」及「施主與喇嘛為平等及友誼關係」和「皇帝與僧侶為主宰及臣屬關係」等的對立，並指明在前述對立的觀念中西方不同視野之所在。



於中國的一部份，所以在提到這兩個民族對稱的時候，不用「漢藏」而用「中藏」以示西藏與中國在格位上是相同的。

其次，以國際法的角度為衡量。一九八七年在美國卡羅拉多州的西方評論出版社（Westview Press）出版了**西藏的地位**一書。作者是荷蘭裔美籍米凱爾·范瓦爾特·范普拉赫先生（簡稱范普拉赫）（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他是國際法學者，並擔任過西藏流亡政府領袖達賴喇嘛的法律顧問。他的著作基於國際法的角度，從歷史、權力及其前途來論證西藏是獨立的。其著作分為幾個部分，首先是從歷史上的淵源，說明自七世紀以來西藏就是獨立的，再從國際法上說明西藏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作者以大量篇幅來描繪中國政府解放、統一西藏是對西藏的侵略，西藏從來沒有接受在武力威脅下簽訂的《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其中選用了一定的篇幅闡述國際法上所謂國家、領土的取得原因，及保護國、宗主國的定義。

值得注意的是，范普拉赫先生的著作中，有一個重要的依據，就是引用國際法中關於確定一個政治實體的原則。根據這個原則，他認為只要具備土地、人口，有政府實施管轄權，即是符合國際法所規定之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從而認定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⑥。

然而，吾人認為對一個地區之政治地位，不能光是從法律、制度層面來分析，制度有賴人之運作，制度脫離人之行為則成為完全空白；我們必須從各單位之運作來分析其實質的地位。如其自治程度如何？其運作方式是否獲得藏民之認同？傳統社會政治為宗教而服務，因此，為了瞭解其實質之地位，必須瞭解宗教是否與以往一樣支配著政治之運作。

再次，國際關係的地位。學者楊開煌在其一篇文章「達賴喇嘛『西藏問題』國際化之策略分析」，提出「西藏獨立運動」自一九五九年之後，之所以成為中共政權的挑戰之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西藏人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成功地將西藏問題國際化，使西藏長期高度地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雖然達賴在國際化「西藏獨立運動」上頗有收穫，然而在中共不斷改善其治藏政策之餘，「西藏獨立運動」的解決則毫無進展；他以為問題在於：達賴喇嘛和流亡組織將國際化的手段「目的化」是主要的原因。同時也過度醜化中共的方式，而使其宣傳效果大打折扣，而且模糊了反共的本質，變成是反漢人、反華人；他以為這不只是不當，而且是危險的。

其實，我們討論「西藏獨立運動」問題時，除了達賴喇嘛的國際上活動導致獲得國際上地位以外，更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中國大陸在國際上外交勢力與政經上不可忽略的發展。

最近南韓有個很明顯的例子。比如：二〇〇〇年十月十七日，南韓外交部發言人

註⑥ 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 *The Status of Tibet: History, Right, and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Law*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7), p. 93.



李南孫在一項發言中對外界表示，謝絕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來訪，因為時機並不恰當，並且婉拒核發其訪問入境簽證，以避免中共的外交責難^⑦。外交部有關官員進一步指出，由於籌備委員會預計達賴訪韓的時機（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二日），正是中共總理朱鎔基訪韓及「亞太經合部長會談經濟合作體」APEC 和「東南亞國家聯合」、韓、中、日三國會談，由南韓總統金大中和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進行會談。此舉說明了南韓政府不允許達賴十一月訪問南韓，亦非無限期的等待南韓政府允許達賴訪韓^⑧，並凸顯了南韓政府不允許達賴十一月中訪韓的有關外交背景。這是南韓政府首次對外表明政府「對達賴訪韓」乙事的明確立場^⑨。儘管南韓反對黨 Grand National Party 極力要求政府收回成命^⑩，不過達賴喇嘛訪韓乙事，起死回生的可能性不大，只是南韓人民的自尊心傷得不輕，南韓為保國家長遠利益，拒絕達賴喇嘛來訪情非得已，心中盤算的中國大陸的市場大餅所附帶的無限商機，以及中共與北韓加乘的軍事威脅，也是南韓在處理達賴喇嘛訪問之事不得不戒慎恐懼的原因。

當初，南韓佛教團體邀請達賴喇嘛首度到韓城訪問，但中共警告南韓勿接待達賴喇嘛，說他是分離主義份子，不應提供其鼓吹西藏自治的舞台。面對如此嚴峻的情勢，截至目前為止尚未能找到南韓外交部官員就此事置評。

三、「西藏獨立運動」之緣起

「西藏獨立運動」議題如同全球其他區域族群統獨衝突一樣，在冷戰時期，逐漸吸引世人關注，但或許是宗教因素，或許是達賴的個人色彩，西藏獨立運動相較於其他地區，顯得很不一樣。這種西藏式的獨立運動固然獲得不少國際友人的支持，但也為自己佈下了困境。

論及「西藏獨立運動」之起源時，我們可以從二方面談起：第一，清廷國勢力的侵入；第二、西藏人民對宗教的信仰。

首先，外國勢力的侵入。英國自佔據印度以後，為了保護印度的北方安全，以防止帝俄的南下，乃一心一意地希望把西藏作為緩衝地。起初是與清廷交涉，以取得在藏的利益。由於清廷滿清力量衰退，藏人為求自保，不服清廷的決定，乃拒絕履行條

註⑦ <http://news.bbc.co.uk/hi/english/world/asia-pacific>

註⑧ 中央日報，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十八日，第十版。請參考 Korea Times, August 29, 2002, <http://www.tibet.ca>.

註⑨ 南韓政府正式向外界宣布拒絕達賴喇嘛來訪後，西藏流亡組織日本東京東亞代表札珠仁波切（Zatul Rimpoche）在接受 Korea Herald 記者訪問時表示，南韓無需懼怕中共的外交反擊，無論達賴喇嘛所到何處，中共總是口出威嚇，但是光是說不練，沒有下文。Korea Herald, November 2, 2000, See World Tibet Network News, November 2, 2000, <http://www.tibet.ca/english/> 言下之意中共充其量不過是隻紙老虎，但是中共是不是紙老虎，國際社會心知肚明，不敢小覷。

註⑩ Korea Times, October 31, 2000, <http://www.koreatimes.com.kr>



約上的規定。英人發現此情況後，試圖直接與藏人交涉以達到其目的。藏人在英國威脅下看到滿清無力保護藏地時，乃思聯俄以抗英。但是俄國積極考慮於與英國劃分勢力範圍，除以聯絡西藏故作姿態外，不能進一步提供對西藏的協助，十三世達賴不久自嘗英軍侵藏的苦果，被清廷革其名號，轉而憎恨清廷，反而在逃亡印度期間接受英人的支持以對抗清廷。這些演變都是因英人入侵的結果。清廷在英兵入侵西藏迫訂藏英條約以後，才覺得事態嚴重，一面整飭藏政，一面調派川軍入藏，時值辛亥鼎革，軍紀渙散，使藏人未蒙其利反受其害。在藏人望雲霓之際，反而破壞藏人對中央的向心，種下外傾的惡果^①。

一九〇三年十月，英國人侵略西藏，一九一〇年中國軍隊續之，十三世達賴喇嘛轉逃到蒙古和印度，第一次體會到獨立必須要有他國支持，就此展開西藏獨立運動。一九一二年，十三世達賴喇嘛趕走了清軍，然後宣布獨立，自此至一九五〇年間，許多國際學者，尤其西方學者都認為西藏事實上是獨立的。

雖然中藏雙方各有學者引述不同資料，作為自身主權論述的依據，但仍有證據顯示西藏曾經獨立的事實。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當局與西藏政府代表團在北京簽訂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其中第一條即闡明：「西藏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言下之意等於承認在中共所謂「解放」西藏之前，西藏曾經獨立的事實。

一九一二至一九五〇年的西藏，雖然主權獨立，領土卻不完整，因外來的侵略從未停止，西藏政府並不能保證其所有土地與人民均在政教領袖達賴喇嘛的管轄內。

其二，西藏人民對宗教信仰的虔誠。佛教的信仰已普及到每一個藏人的生活當中，沒有宗教信仰，其生活生不如死。因此，一九五一年，當中共四路攻擊西藏，在佔據藏區後，不僅沒有遵守協議上的承諾，保持西藏的傳統宗教文化，反而加以破壞，並且實行土改，鼓動階級鬥爭，強迫喇嘛還俗，使以宗教為主的西藏人民憤怒不已，因此引發了反共抗暴戰爭。藏人也因此對協議中的「自治」失去信心，而為了保全其宗教文化的傳統，不得不提出西藏「獨立」的主張，以博取世人的同情。

其實，達賴十三與達賴十四的兩次獨立運動，實質上有絕大的不同。就背景來看，達賴十三是處在滿清末年，民國初建的時候，且當時達賴十三是被革去名號，逃亡到印度。其後藉著英人的協助支持，乘中國內部不穩之際，返藏驅逐中共駐藏官員後宣布獨立。此時的宣布獨立，純粹是在中國力量薄弱時發生，並非在國家正常狀況下提出，因此，達賴十三的行為乃有趁火打劫之嫌。而達賴十四的主張就背景上來看，就比較能博得世人的同情（並不是表示我們贊成其獨立主張）。中共藉著強大的武力進入西藏，使脫離中國已一段時間的西藏又納入中國領土中，且西藏政府已在協議中承認中國在藏主權（不管這是否在中共威脅下簽字承認的），中共應藉此好好籠絡藏人失去已久的向心力。但中共卻沒有這麼做，使得西藏在飽受中共的破壞，人權被剝奪，

註① 楊公素，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一七〇～一八六。



宗教信仰受壓抑後，爲了求生存和保護其傳統文化，不得不抵抗，而在反共抗暴運動失敗，逃亡印度，進而主張獨立，希望世人以一個獨立國家的地位來看待他們，冀能獲得實際的援助，以達成其維護宗教文化乃至政治社會制度的目標。對此，西藏流亡社會異議人士拉桑才仁說：「在西藏，民族或是國家觀念的產生，宗教的影響遠遠強過政治，比如僧人要到西藏去學習，喇嘛就是地方領袖，也要有拉薩的認定，這些宗教的因素使我們產生『一夥的』整體感，遠遠強於政治所賦予^⑫。」中共入侵時藏人也許沒有明確提出主權要求，但他們的行動已表現了這一點，可以確定的是，他們否定了中共的統治，這就是一種獨立運動。

西藏獨立思想在中共入藏後不斷升高，面對異國或異族入侵與離鄉背井的痛苦，藏人在情感上無不渴望早日獨立。西藏因反抗中共的民主改革運動，在西藏內部掀起前所未見的護教運動，大批紅衣喇嘛投入戰場，雖然以保護宗教爲名，但實質目的在於趕走中國漢族，西藏今日的獨立意識、國家觀念均發源於此。

從此以後，五十多年來，由於歷史上難有判準的中藏主權之爭，史無前例地在印度與西藏（中國大陸）建立了兩個西藏。

「兩個西藏」存在著不同的統治者，對西藏疆域有著「大西藏」與「西藏自治區」不同的界定；「兩個西藏」對歷史亦有不同的建構理論^⑬，而對中共入藏後的功過、對台灣問題的看法、以及對於西藏現況，都有著不同的價值觀；而對於未來的西藏前途，雙方雖提出「自治」的相同看法，但在內涵上，卻完全不同。

四、第一階段（一九五〇年～一九八〇年代）

學者們頗有共識，現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大多數有關漢藏關係書籍中，描述的內容皆沒有超過如下的範圍與解釋：

從第七世紀開始，西藏與中原的關係就史不絕書，不論是軍事的和戰關係、茶馬交易的商務關係、檣樵關係亦或是君臣關係，漢藏兩民族千餘年來亦有深切的相互影響。直到十九世紀末，由於西方勢力在西藏已達某種程度的影響，乃造成藏族的部份統治階層在心理上對中原民族的歧見。由歧見而生紛爭終至發展成現代的西藏問題。

註⑫ 林照真，最後的達賴喇嘛（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民國八十九年），頁一五〇。

註⑬ 西藏流亡政府要求的西藏獨立，或者是達賴喇嘛現在主張的西藏高度自治，範圍所指都是根據「大西藏」理論。倘若「大西藏」的250萬平方公里與中國大陸分離，中國大陸的西部邊疆向腹地收縮上千公里。如果在中國大陸版圖上打兩條對角線，交點也就是中國大陸的中心在甘肅天水。「大西藏」獨立，天水離「新邊界」只剩100多公里距離，現在的甘肅就變成了邊疆。中國大陸以往出現國難危機，腹地四川往往被當作「大後方」，或「偏安」，或「陪都」。而四川的省會成都，距「新邊界」也只是一百多公里，成爲邊防前線。所以，一旦西藏獨立並且別無選擇地與印度結盟，印度就可以不發一槍一彈長驅幾千公里，把軍事力量部署到中國大陸腹地，其導彈借西藏高原能打遍中國大陸全境。失去西藏天險屏障和不怕戰火的西藏高原之迂迴空間，戰爭就將在中國內地進行，生命財產必會遭受重大損失。可想而知，讓中國大陸失去如此廣闊的屏障，暴露出致命「軟腹」，從國家安全角度是不能接受的。



無論在古代或十九世紀藏漢關係具有多麼微妙的特點，二十世紀前十年餘所發生的三件事便極大地改變了這種情況：1. 隨著英國對西藏興趣的增長和關係的加深，導致了一連串入侵西藏的事件，並於一九〇四年佔領了拉薩；2. 中國中央王朝重新確立對西藏控制權的努力的結果，導致了一九一〇年初中國將軍鍾穎對拉薩的軍事佔領；3. 中國一九一一年發生了推翻滿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以及西藏清朝駐軍的兵變。

進入當代，一九五一年共產黨軍隊進藏以後，西藏更是完全被遮蔽在鐵幕之後。一九五九年大批藏人逃離西藏後，中共在一九八〇年以來更積極推動「對外開放」的政策。

據吾人的觀察，中國大陸官方與學界同時存在針對達賴流亡政府一向立場，這方面的重點可以歸納如下：

首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鄧小平秘密會見達賴二哥嘉樂頓珠（Gyalo Thondrup），提出關於對話的問題開始。

鄧小平於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第一次正式接見嘉樂頓珠時，對嘉樂頓珠說：「根本問題是，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對與不對，要用這個標準來判斷。現在是以西藏作為一個國家與中央對話，還是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來討論處理一些問題。這是一個現實問題^⑭。」

中共對達賴喇嘛的立場，在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便曾對嘉樂頓珠提出五方針（對達賴喇嘛的五條方針）^⑮：

（一）「我們的國家已經走上政治上長期安定，經濟上不斷繁榮，各民族能夠更好地團結互助的新時期。達賴喇嘛和跟隨他的人都是聰明的，應該相信這一條，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幾年，也是可以的。」

（二）「達賴喇嘛和他派來向我們接觸的人，應該是開誠佈公，不要採取捉迷藏或做買賣的辦法，對過去的歷史可以不再糾纏，即一九五九年的那段歷史，大概忘掉算了。」

（三）「我們誠心誠意歡迎達賴喇嘛和跟隨他的人回來定居。我們歡迎他們回來的目的，是歡迎他能為維護我們國家的統一，增進藏漢民族和各民族的團結和實行四個現代化做貢獻。」

（四）「達賴喇嘛回來定居後的政治待遇與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來的待遇不變。黨中央可以向全國人士建議選他當副委員長，並經過協商，當全國政協副主席。至於西藏的職務就不要兼了。西藏現在年輕人已上來，他們工作做得很好。當然，達賴也可以經常回西藏去看看。我們對跟隨他的人也會妥為安置，不用擔心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只會比過去更好一些，因為我們國家發展了。」

（五）「達賴喇嘛什麼時候回來，他可以向報界發表個簡單聲明，聲明怎麼說，

註⑭ 華子，「復評達賴喇嘛與中央政府的談判問題」，中國西藏，二〇〇二年一月，第一期，頁二。

註⑮ 〈中共對達賴喇嘛的「五條方針」〉，摘自西藏流亡政府中文網站。請參見 <http://www.xizang-zhiye.org/b5/hhdl/zhonggong.html>



由他自己決定。他哪一年，哪一月，那一天回來，給我們一個通知。如果從陸地上經香港到廣州，我們就派一位部長級同志到邊界去迎接，也發表一個消息。」

一九八二年四月，達賴首度正式派出「三人代表團」前往北京與中共中央會談。一方面，達賴從這時候開始在國際上從事宣傳，放出擬回西藏的訊息。一九八四年十月，另一個「三人代表團」赴北京時，轉達了達賴願與中共中央保持聯繫、增加瞭解的願望，以及希望在一九八五年回去參觀。當初中共表示歡迎，並重申五點方針。達賴並未如期回去看看，中共感到達賴缺乏誠意，一九八六年七月，中共拒絕達賴派出的第五批「事實探尋團」。經過五、六年的接觸，中共始終無法達成與達賴直接對談。易言之，所有的接觸都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果。

那麼，此段時間中共與達賴的互動關係當中，雙方雖然探索和努力然而沒獲得具體的成果。達賴終於八〇代末對中共公開提出理論性的談話。

一九八七年九月，在美國國會，達賴提出了解決西藏問題的「五點和平計畫」^⑥理論對抗胡耀邦提出的「五條方針」。所謂「西藏地位」問題提出「五點和平計畫」理論要求把西藏變為「和平區」。可以概括為：1. 把整個西藏轉化為一個和平地區；2. 中共停止危及藏民族生存的移民政策；3. 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權和基本權力；4. 重建和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中共放棄在西藏製造核子武器及儲存核子廢棄物；5. 對西藏未來的地位和藏族人民關心的問題進行真正的會談。然而實際上，達賴基於其五點計畫，缺乏國際上的積極支持，於一九八八年四月七日訪英時，亦表示願與中共妥協，提出「中間方案」(Middle Way Plan)理論，來解決西藏問題。其主要內容是：「西藏並不是完全獨立，但是須與中國地位平等，互相尊重，西藏可以存在於一個中華共和國之內。」^⑦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達賴出訪歐洲會議，提出了「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建議」^⑧。西方輿論認為這是一個妥協的「中間道路」。

達賴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所舉行的歐洲會議發表的一篇談話中，又進一步詳述新模式下的權力關係。即中共有權處理西藏的外交事務，並暫時有權在西藏駐軍，但希望在內部事務上讓藏人全權自理。而且「人民解放軍」在一段時間後應撤出西藏，使

註⑥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達賴喇嘛在美國參議院人權小組演講提出五點和平計畫。(中共對達賴喇嘛的「五條方針」)，摘自西藏流亡政府中文網站。請參見<http://www.xizang-zhiye.org/b5/hhdl/she-ngming.html>。

註⑦ 中央日報，「西藏自治區與西方主流思潮」，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第八版。

註⑧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由於達賴喇嘛無法在法國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歐洲會議上發表演說，因而在會議大廈內舉行記者會，發表了斯特拉斯堡建議方案：西藏應當成爲一個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實體，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聯盟」的關係。中心內容可以概括如下：一、中國政府負責西藏外交事務，但是西藏政府在國外可以設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辦事處。二、藏政府加入世界人權宣言。三、西藏政府應該由通過全民投票選舉出執行首腦、對財政立法和獨立的司法體系組成。政府所在地是拉薩。四、西藏經濟、社會體制應該根據西藏人民的意願來決定。五、西藏禁止核武器或其它武器的製造、試驗、以及核能的利用。請參考<http://www.xizang-zhiye.org/b5/hhdl/yanshuo.html>，〈在歐洲會議的演說詞〉，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五日。



西藏「非軍事化」，成爲一「真正的和平聖地」；達賴並要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成聯盟的自治民主政治實體」。達賴喇嘛進而在六月二十四日，接受中國時報駐瑞士特派記者龍應台訪問時，亦公開承認其新方案即「一國兩治」^①。達賴的兩次建議，都提出來要求與中央政府就「西藏的未來」舉行談判。對此中共政府指出：「斯特拉斯堡建議」的某些提法同「五點和平計畫」相比有一些變化，但其實質依然是中國對西藏擁有完全主權。

值得觀察的是達賴喇嘛提出中間方案之原因：達賴與其徒衆，數年來爲藏獨運動而奔走，雖然獲得衆多國際同情與輿論支持，惟沒有獲得各國政府的承認與鼓勵。大家知道，任何獨立運動，如不能獲得官方的支持就難以成氣候，這點達賴比我們更清楚。

達賴並且第一次明確地表示放棄西藏獨立，同意西藏留在中國之內，並同意由北京負責西藏的外交和國防。但是，對這一妥協，他附加了幾項限制性條件：1. 與中國結盟的西藏必須是將中國所有藏區統一在一起的「大西藏」^②；2. 西藏將實行與中國內地完全不同的民主政體，由西藏人自己進行高度自治；3. 雖然北京負責西藏外交，但西藏政府可以保留外交辦事處，在「非政治領域」發展獨立的對外關係並參加國際組織；4. 國防方面，僅同意「在西藏非軍事化及中立化之前，中國可以在西藏保留有少數的軍事設備」，並限制那些軍事設施是「防禦性」的。

中共政府起初表示願意和西藏流亡政府對談，但後來態度轉趨強硬，說唯有達賴公開宣稱西藏還有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彼此才可能對話。

中共一九八八年發表聲明，邀請達賴與其會談，地點可在北京或任何地方。但中

註① 中國時報，「失落的香格里拉—達賴訪問記」，民國七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二版。一九八二年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治」的構想，用以和平解決統一問題。一九八二年，達賴喇嘛的三人代表回國時提出「要求按對待台灣的辦法對待西藏」。他們認爲，西藏歷史上就擁有特殊的地位，現在更應該擁有特殊的待遇，西藏應該享有自決權。因爲早在一九三一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中國共產黨表示，蒙古、西藏、雲南、貴州的少數民族地區都享有自決權，可以分離出中國，建立獨立的國家。所以中共中央要尊重西藏人民的自決權。此後達賴方面多次提出用「一國兩治」的辦法解決西藏問題。從一九八七年的「五點和平計畫」到一九八八年的「斯特拉斯堡建議」，達賴正式闡述了其解決西藏問題的基本立場。這一建議中的某些提法似乎與鄧小平的「一國兩治」構想頗有相像之處。比如，在「斯特拉斯堡建議」中，達賴提出：「西藏應當成爲一個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實體，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聯盟的關係」；「由中國政府負責西藏的外交事務，但是西藏在國外可以設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辦事處；西藏政府應該由通過全體投票選舉出執行首腦、立法會議和獨立的司法體系組成」。

註② 按照當前行政區劃，中國藏區共有 1 個自治區，10 個自治州，2 個自治縣。中國大陸通用的西藏地區概念，一般是指行政建制上的「西藏自治區」面積 122.84 萬平方公里，人口 230.43 萬，其中藏族人口 223.59 萬。而國際上流行的西藏概念（Tibet），除了西藏自治區（Tibet Autonomous Region），還包括青海全省、甘肅南部、四川西部和雲南西北部，囊括整個青藏高原。達賴喇嘛認爲「所有藏人居住區」，或歷史上藏文明覆蓋的全部地區，其面積比西藏自治區大一倍（西藏流亡政府公布爲 250 萬平方公里），超過中國總面積的四分之一。在這片土地上，共有藏族人口 457.38 萬，另有 200 多萬的漢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口。此即「大西藏」。區分兩個西藏的概念非常重要。凡談論所謂「西藏問題」，一定要首先弄清楚到底是哪一個西藏。「西藏」概念的不同，已經導致了極大混亂。



共表明與達賴對話，仍有一定的限制及條件。中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阿沛·阿旺晉普美，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在深圳曾表示：「中共的態度是，如果代表團代表達賴喇嘛個人，我們歡迎他來會談，但如果代表團代表達賴喇嘛屬下的『政府』，則中共不會承認這個政府，亦不會與之會談^②。」

他又補充說明，代表團不能有外國人參與。「不准談論獨立、不是代表政府、不能邀有外人」的「三不規定」。

具體而言，達賴的兩次建議都提出和中共政府就「西藏的未來」舉行談判的要求。中共針對達賴要求，公開說明三個原則：不能「噶廈」名義派出代表團；斯特拉斯堡建議未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不能作為談判基礎；可以在任何地方舉行會談，但不能有外國人參加。

此階段裡我們稍加分析，即不難理解，中共政權尤其高層領導人較有彈性的態度（條件性談判）以及主動的政策來處理西藏問題。因為是由西藏的特殊性決定。西藏與新疆、內蒙古、寧夏、廣西四個民族自治區相比，其特殊性是：其一，單一民族聚居度高。當地藏族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其二，全民信教。佛教在社會生活中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其三，有相當一部份宗教人物在許多西方國家鼓吹「西藏獨立」。基於西藏的這些特殊性，中共政策應授予西藏地方政府更多的自治權，在政治上實行比目前更多的變通；經濟上除保留能源、交通等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因素外，在其他經濟領域實行更寬的政策，以適合西藏生產力落後的事實。然而，中共的宗教政策還是有需要考慮的空間。中共對少數民族政策中，以宗教問題最為重大。中共對西藏的宗教政策，實際上可以說是空白的。因為，西藏地處世界屋脊，可能是地球上除南極和撒哈拉外，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地方，自然環境極為嚴酷，生產力和生活水準十分低下。處在如此艱難生存狀況下的西藏先民，對與來自古印度的密宗佛教一拍即合，如獲至寶，篤信至今絕非偶然。在此種情形下，即使中共在國際間不斷宣傳現代化為西藏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對篤信佛法的藏人最無法忍受的是，信仰無神論的中共馬列政權，摧毀了藏人千年來安身立命的宗教信仰，這就不是北京宣稱的現代化所能挽回藏人民心的，因為宗教就是人心。換句話說，畢竟，民族問題追根究底是人心的問題，如果境內藏人真都像它說的那樣「心向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大家庭」，它早就會視流亡藏人為無物，不當成問題了。同樣，流亡藏人若是得不到境內藏人呼應，也就會自生自滅而被歷史遺忘。

總之，這階段裡我們看到雙方皆有堅持的立場。對中共而言，領土完整及祖國統一的原則是絕不讓步。因此，中共對達賴喇嘛的政策自一九八一年胡耀邦向嘉樂頓珠提出的「五條方針」後，未曾改變過。其中最重要一點是，要達賴公開放棄獨立的主張，承認西藏為中國的一部份。此外，一九八八年出現「舉行會談」曝光時，中共提過會談「三原則」。十多年來，中共未曾鬆動過這兩個基本原則。

而達賴方面，從公開地宣稱尋求「西藏獨立」到一九八〇年代以「五點和平計

註② 「社論」，星島日報，一九八八年十月五日，第一版。



畫」、「斯特拉斯堡建議」取代的訴求中，雖沒有提及獨立主張的字眼，但達賴就是沒有接受中共建議，公開表示放棄獨立主張，因此，他的任何新建議皆為中共解讀為尋求「半獨立」或「變相獨立」的主張。何以達賴遲遲難以說出放棄獨立的主張，其關鍵在於流亡政府內部對於獨立的立場不同的聲音，達賴無法整合內部意見達成共識的情形下，確實有其難言之處。

五、第二階段（一九八九年～二〇〇二年）

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西方國家在一九八〇年代以前對達賴喇嘛集團是冷淡的、保持距離的，主要的原因是在冷戰體系下，特別是在七〇年代之後，美國希望「聯中制俄」的策略奏效的戰略佈局下，與達賴集團的接觸對西方集團的國家利益而言是大大不利的，因此達賴喇嘛流亡組織自一九五九年在印度的達蘭薩拉成立之後，一直企圖遊說西方國家給予支助，以便西藏有可能脫離中國而獨立，不過在九〇年代以前，這一類的努力基本並沒有獲得西方國家的官方公開地、全力地支援，這就反映出來此一時期達賴集團對西方國家而言，不在國家重要利益的考量範圍。

然而，自從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六四」事件以後，情況出現微妙的變化。

首先是一九八九年冬天達賴喇嘛忽然獲得了瑞典的諾貝爾和平獎，此一頭銜的獲得促使達賴喇嘛在西方社會的活動增加了一個十分有利的籌碼^②。

其次是「六四」事件之後，西方國家開始聯合抵制中共，特別是在九〇年初的「蘇東波」效應發生之後，冷戰形勢已破，因此使得中共的角色與力量在西方新的戰略佈

註② 無疑地，一九八九年對世界、對「中國」、對達賴喇嘛都是十分重要的一年。具體而言，在這一年的三月，西藏拉薩再次發生動亂，中共在三月七日宣布戒嚴。另外在北京從年初就發生學生的民主運動，結果引發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在國際間最大的變局是東歐的原共產黨專政的國家政權易手，如德國統一，東德消失；蘇聯的局勢動盪不安。在此一國際氣氛之下，西方世界對中共鎮壓民主運動行徑的震驚和無奈是可以想見的。個人以為西方國家為了表示對「中國」的「懲罰」和加強影響西藏局勢，因此將一九八九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達賴喇嘛。自此之後，對達賴產生了兩個直接的影響：一是達賴喇嘛成為世界性的新聞人物，動見觀瞻均成為西方媒體重視的焦點，特別是美國好萊塢的明星也有皈依為藏傳密宗的信徒，更增加國際媒體的重視，而報導達賴動向自然會對西藏問題產生關切。二是達賴喇嘛除了是西藏的宗教領袖、流亡組織的領導者之外，又多了一個世界各國都可以接受的頭銜——「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這對達賴在國際上的行走自然產生莫大的方便，也使得「西藏問題」成為國際上矚目的焦點之一。然而吾人質疑的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北京的天安門事件以及蘇聯解體和東歐的劇變。這一系列的事件跟達賴喇嘛諾貝爾和平獎的時間恰好一致，不知叫人如何解釋？於是，這種事實使達賴喇嘛過於樂觀地估計了形勢，他「預言」中國可能在三至五年內發生像蘇聯一樣的變化，聲稱中國的領導層不穩，中斷了與中央政府的聯繫。然而，事實卻是到今日為止，中國北京政府的領導地位並未出現任何的動搖。究竟應該如何解釋此種情況？其實，我們仔細觀察，達賴的主張，就是民族自決、和平、人權、環保、反核，這些可以說是完全符合西方主流思潮。再加上，達賴並不直接訴諸西藏獨立，他強調的是將西藏建成一個沒有軍隊、沒有環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護區，一個受國際社會監督的和平區。達賴對未來西藏藍圖的勾勒，顯然與西方人心目中理想的淨土相一致，而這也是達賴廣受國際社會歡迎的原因之一。



局中重新加以檢討，因而中國也從西方國家拉攏聯合的對象變成潛在的對手和敵人。因此在九〇年代開始，不論是達賴喇嘛所努力的西藏問題國際化或是台灣要求的高科技高性能的武器，以及東南亞各國的美國駐軍問題，都有了新的變化。那麼，面對如此變數和情況之下，中共政府的反應與立場為何？

中共高層領導階層之一李鵬於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指出^②：「我們的根本原則有一條，即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在這個根本問題上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中共政府一貫表示願意同達賴進行接觸。但是達賴喇嘛必須停止從事分裂祖國的活動，改變『西藏獨立』的立場，除了『西藏獨立』不能談，其他問題都可以談。」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美國哈佛大學發表演講後，有人向他提問中共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的談判問題。江澤民明確地闡述了中共政府的原則立場：只要達賴喇嘛真正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停止分裂祖國的活動，公開聲明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談判的大門是敞開的^③。

一九九八年六月底七月初，美國總統柯林頓對中國進行了為期九天的正式訪問。時間之長，規格之高，舉世矚目。但是，訪問期間最引人注目的卻是兩國首腦於六月二十七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因為在這次記者會上，江澤民與柯林頓進行辯論。而且中國中央電視台首次全程直播了這次重要的記者會。

中美領導人在記者會上，談了台灣問題、人權問題以及宗教問題。這些都是敏感的問題，中美存在重大分歧，但雙方領導人對這些問題均談過多次。顯然，西藏問題一樣十分敏感。兩國首腦在西藏問題上，使用了幽默的語言^④：

柯林頓：「我同達賴喇嘛是好朋友，與他見過多次。我相信，如果他與江澤民主席談一次的話，他們倆會喜歡對方的。」

江澤民：「談到漢藏關係的歷史，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援助，最後談到中央同達賴喇嘛舉行談判的問題：只要達賴喇嘛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那麼，我們與達賴喇嘛對話與談判的大門就一直敞開著。」

江澤民與柯林頓談西藏問題，這是中美兩國領導人首次正式談西藏問題與達賴喇嘛。儘管雙方語氣誠懇幽默，但是，這同時表明西藏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地位愈來愈突出，並且成為經常性的焦點。

進而二〇〇一年三月達賴第二度訪問台灣。雖然相關單位均一再強調達賴此行乃純屬宗教及民間的活動，不涉及政治問題，但證諸以往的經驗及達賴「政」教領袖的

註^② 大公報，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三版。

註^③ 大公報，「要聞專題：達賴空喊要談判實際搞『藏獨』」，一九九九年六月三十日，第四版。一九九七年十月江澤民應美國總統之邀，在美國進行了「國是訪問」，中美之間簽訂「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新架構，使得一九九八年雙方談判前的喊話中，中共更進一步擺高姿態，而達賴喇嘛的公開講話開始有了些許的改變。

註^④ 直云邊吉，達賴喇嘛一分裂者的流亡生涯（北京：海南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頁二～三。



雙重身分，其來訪的政治目的及所可能引發的政治效應，朝野仍不可不察^{②⑥}。

吾人由歷次事實可知，達賴訪台乃有意行「一石兩鳥」之策，一方面弘法灌頂，接受台灣施主的鉅金供養，以挹注財政困窘的西藏流亡政府；另一方面則是欲製造「台灣與藏獨勢力合流」的假象，提升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實力，增加北京的不安全感，從而獲得談判西藏前途的機會。

然而，值得觀察的是中共二〇〇二年九月九日邀請兩名西藏流亡政府的代表到北京訪問，其中包括達賴駐華府代表絡地嘉里（Lodi Gyaltsen Gyari）和達賴駐歐洲代表格桑堅贊（Kelsang Gyaltsen），這是從一九八四年以來，首次有西藏流亡政府的高層代表公開進入西藏^{②⑦}。

此事件或變數之出現，從各方面的反應來看，似乎此次的私人代表訪問是一次雙贏的接觸，從西藏流亡組織自己的反應到國際上各國的反應，大致都是肯定，尤其是流亡組織達賴本人對此次成功的訪問均有相當的期待。

首先從西藏流亡組織的反應：除了在正式的聲明中肯定中共對發展西藏並保存西藏的宗教、文化、語言、環境的努力，同時也肯定治藏官員的熱衷和能力，對北京聲明中說「比起當時（八〇年代）的中國領導人，感覺現在的中國領導人邁向了開放之路」，這種對中國官員和治藏官員的評價是值得參考的。

但是在各方熱烈期待之下，作為談判要角的另一方中共，對此事的反應則極為冷漠。從中共到地方都沒有任何報導，中共這種只作不說的方式在以往並不多見，或許此次的訪問在中共中央的內部尚無一致性的意見，有人主張從大戰略的角度不妨一試，有人則對達賴喇嘛的「形自治，實獨立」的主張大不以為然。有人認為在過去十餘年在大陸內部有關達賴喇嘛的問題已經定性、定調，如今與之接觸，一時之間很難自圓其說，以致此次訪問不得不淡化的方式，以便有時間在對內的政治社會化中逐步調整。另一種可能是先對此次雙方試探性的接觸作出效果性評估，再來決定下一步政策應該如何進行，因此暫時不作宣傳，以保留未來的彈性^{②⑧}。

對中共政府此一突發性的態度變化我們如何理解？從外界的角度來看，中共同意達賴的私人代表訪問大陸，雙方此次接觸的意義為何？對日後雙方互動有何影響，充滿了想像空間。

在國際社會眼中，這次訪問燃起外界關於中共將與達賴喇嘛重新展開對話的希望。但學界認為，回顧一九八四年的情形，雙方也很有希望改善關係，但最終仍歸於失敗，

註^{②⑥} 其實，一九九七年三月達賴首度訪台後，遭到中共的嚴重抗議，達賴隨即表示：「只要中共願意恢復和談，將無限期延期訪問台灣。」訪台成為達賴向中共討價還價的籌碼，但中共的態度絲毫未見軟化，反而再強調要求達賴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必須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否則拒絕談判。

註^{②⑦} Mr. Lodi Gyaltsen Gyari is the Special Envoy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Mr. Kelsang Gyaltsen is the Envoy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國際西藏遊說組織），請參考，<http://www.savetibet.org/Tibetan/TibetanMain.cfm>。

註^{②⑧} 蒙藏委員會編印，蒙藏現況雙月報，第十一卷第六期，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頁三五。



而目前的情勢又今非昔比，中共已經比當年更加強大，更加具有影響力，談判因此將更加困難。著有雪域之龍一書的茲仁夏嘉就表示，「中國已經越來越有自信」，「任何談判對藏人來說，都將困難得多」^⑳。

頗為值得注意的是，達賴特使訪問大陸期間，中共外交部被問及情況時，僅表示有一些國外藏胞以「私人身分」，回到大陸和西藏等地走親訪友，瞭解西藏現況，完全迴避他們是達賴特使的身分；而大陸媒體不僅未提達賴特使，連國外藏胞到西藏走親訪友消息，都隻字未見。是否北京政府並不是真心想重啓與達賴雙方的對話，只想打打「改善人權牌」，為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訪美製造良好氣氛；也想藉由此舉，使流亡在外的西藏異議分子不再在江澤民訪美期間製造混亂^㉑。

有不少外電猜測中共此次的政策轉變是爲了江澤民訪美而作的宣傳，然而，至於中共之所以傾向願意嘗試重開與達賴喇嘛的接觸之門，台灣學者楊開煌認爲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共對自己的治藏政策和治藏工作開始比較有信心。例如，中共最近釋放了六名被控犯有政治犯罪行爲的藏胞，放鬆了外國記者赴西藏的探訪，以及派出西藏文化訪問團等舉動，都是直接、間接地代表了中共在這方面的信心^㉒。中共對西藏的態度在政策上，實際運作而言，中共改革開放後，特別是「西部大開發」以來，中共對藏政策已爲當地建設了大批重點項目。這些建設集中在一九八五年及一九九五年，慶祝西藏自治區二十周年及三十周年時，中共分別所上的「四十三項工程」^㉓及「六十二項工程」^㉔。

然而有質疑者，恐怕這些建設項目，例如：拉薩飯店、體育館、圖書館、戲院等，事實上除了作爲中共國際宣傳的素材，以及服務中共所供養的治藏集團此一既得利益

註⑳ 中國時報，民國九十一年九月十三日，第十三版。實際上，中共與西藏流亡政府間的對話，始自一九七八年中共元老鄧小平的提議。次年二月起，嘉樂頓珠開始代表達賴喇嘛與中共進行談判。一九七九年三月，鄧小平在接見達賴的代表時，提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對與不對」的中共談判立場與基調，一度還曾商定達賴在一九八八年回大陸。不過，經過八年的談判，中共指責達賴喇嘛未放棄分裂主張，片面宣布一九九三年停止談判。

註㉑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將訪問美國，是中共同意達賴派人回大陸的主要原因；爲營造中共建設西藏成果，以及中共並未迫害西藏人權，中共近來主動組織外國媒體赴西藏參訪，並在國際間大力宣傳西藏。

註㉒ 蒙藏委員會編印，蒙藏現況雙月報，第十一卷第六期，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頁二七。

註㉓ 孫克信，西藏之昨天與今天（台北：宋氏照遠出版社，民國八十四年），頁一九九。四十三項工程：包括交通、能源、商業旅遊、文教衛生和市政設施等。其中二十項修建在拉薩，其餘分布在山南、日喀則、那曲、昌都，工程建築面積達二十五萬平方公尺，總投資近五億元（人民幣）。江蘇、天津、廣東、浙江、山東、四川、福建、北京、上海等省市和中央有關部門承擔了工程任務。

註㉔ 同前註，六十二項工程：一九九四年中共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所確定，負責投資援建工作的國家、有關部委、各省市將此作爲重要的政治任務，抱持高度負責的態度，故原定投資 23.8 億元，一九九三年底，已實際落實投資 36.67 億元。這 62 個項目行業分布廣，種類多。包括農業、工業、能源、交通、郵電、社會發展及技術改造等，幾乎涉及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六十二個項目遍布西藏七個市，七十四個縣，七十多個鄉（鎮）。六十二個項目的推展，就是爲了大幅縮短西藏與內地的差距，使西藏經濟建設再上一個新台階。



外，與廣大藏胞是不相干的。

具體而言，為推動這些現代化建設，中共在西藏供養了一批治藏集團。這批中共長期供養的治藏集團，除了少數高級藏人官員擔心達賴返藏使得大權旁落外，多數藏人職工並不感激北京的供養，甚至還附和達賴的主張。同時，他們並經常利用藏人職工的不滿，做為對北京施壓的籌碼，以此換取北京的財政補貼。

反觀藏族人的觀點，藏人對中共移民之不滿，加強了藏漢間的摩擦。中共為了化解此一種族衝突，採取兩面手法：一方面強調「藏人治藏」，將進藏漢族幹部內調，並大力培養藏族幹部；一方面又鼓勵漢族幹部與當地藏族女子通婚，以姻親關係來化解藏漢間的敵視感情。這種作法是中國歷史以來的常用手法。至於培養藏族幹部的政策，據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員會組織部透露：「自治區經過多年的努力，已使藏族幹部佔全區總數的百分之六十點三四。」然而問題是，主持西藏自治區各方面工作的仍是入藏的漢族幹部，藏族幹部的比例雖較過去略為增加，惟在工作上仍是被領導者。漢人中絕大多數是不懂藏文。此外，中共更運用開放宗教自由的統戰政策，此與中共宗教自由政策是否矛盾？因為例如，中共一面開放寺廟提供觀光，一面卻用種種規定限制藏人進入寺廟膜拜，信徒必須購買門票始可進入。寺廟在一般人工作時間開放，遇到宗教節日或例假日則反而關閉。有的寺廟甚至只准外國遊客和漢人才可獲准進入。這種兩面手法，恐怕無法獲得藏人的信任。

自國家的國際地位角度衡量，無疑是中共在一九九七年底、一九九八年以來其國際地位不斷提升，國內的經濟發展也見其成效，因而表現在處理重大事務上也該頗有自信。再者，中國申辦奧運成功，全國似乎有一股二〇〇八年提升國家力量的期待，各方面皆朝此目標前進，而進行中的青藏鐵路預計於二〇〇六年完成，到時西藏自治區與大陸各地的社會流動（包括宗教、文化、經濟、人口等）將更加快速，西藏也將面臨翻天覆地的改變，對此情形或未來的變化，相信會深深影響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國間的關係，不知雙方如何因應，關係會如何變化，都有待密切觀察。

中共政府對達賴喇嘛的態度始終保持一貫原則與態度，然而其策略上有時彈性，為什麼？其效果如何？我們這裡探討有兩個因素。

首先是重建國際形象：中共自上世紀末開始大力推動睦鄰外交、夥伴外交，領導人紛紛出訪，加大了在國際上宣傳的力度，但是由於制度、價值、文化的不同，加上不時出現的異議人士、分裂份子到處的示威，以及國際反華人士的鼓譟，因此中共國際形象的改善十分有限。本世紀末中共全面融入世界，申奧成功和加入 WTO 都可以說是具體的成果，但仍然對上述的形象沒有很大的改變。倘以達賴喇嘛作為突破口，肯定中國是愛好和平，中國是具有理性可協商的國家形象建立是有幫助的，特別是在法輪功事件之後，外界對中共迫害宗教的印象是根深蒂固的，而與達賴喇嘛的接觸顯然也可以成為對國際反華人士攻擊迫害宗教的一個很好的反擊利器，當然形象重塑是一件長期性的工作，一次的接觸不可能完全改變，但至少是一個開始。換言之，達賴喇嘛的接觸是中共考量其在國際上的得失，我們只看他所允許訪問大陸的達賴私人代表的另一身份，就可以理解中共的企圖，他們是達賴喇嘛駐美、駐歐，以及公關宣傳



的人士，所以我們以為這是中共一個比較戰略性的考量。

其次，分裂藏獨勢力：中共一貫認為打擊敵人最容易的是從他們內部的堡壘攻破，而深入敵人內部的方法就是分裂敵人陣營。在海外的藏胞中，很明顯從表面宣傳來看，有主張激進藏獨的，主張策略性自治的，不論他們真正的企圖為何，對中共而言，那怕敵人「些微的、暫時的、不確定的矛盾」也不應該放過，甚至對沒有明顯矛盾的敵人，中共也想辦法加以區分，如錢其琛區分廣大的民進黨員和頑固的台獨份子就是一例。總之，接受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自然就將達賴喇嘛及其信仰和世界藏族青年大會的頑固、激進份子加以區分，一面使達賴喇嘛的主張在藏族中有更大的迴響的空間，一面也孤立了激進的藏獨派，所以接受達賴喇嘛私人代表的訪問對中共而言，是一種立於不敗的統戰作為^④。

因此，中共對西藏策略上以非常自信的態度與積極的政策來進行，如中共政權最近一、二年不斷派遣西藏文化訪問團：西藏地方官員直接率隊出國訪問，藉官方之便傳播西藏的第一手資料，從而大大影響海外流亡組織在國際上宣傳現況的獨佔性。中國日漸強大的趨勢，一方面使得中共政權更有機會在國際上發揮其影響力，使得流亡組織在國際上的活動、宣傳效果大不如前。另一方面中共政權也更能大力支援西藏，改善藏胞生活，拉大拉薩與達蘭沙拉的差距，而且也大大影響了藏族青年對原有西藏文化的熱衷。

然而，這種思路必須要考慮一個前提，把希望寄託給時間即使是可能的，至少也需要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和領導力量保持幾十年不變；即從現在到十四世達賴喇嘛去世，再到北京選的下世達賴成人才能獲得成果，政治體制和領導力量一旦變化，則會導致這種拖延前功盡棄。時間的拖延不僅對達賴不利，對中國也一樣不利，甚至更不利。不要把達賴僅當作解決西藏問題的障礙，他應是使西藏問題徹底解決的鑰匙。

六、結 論

九〇年代以來，在「西藏問題」上，西方世界常提出「西藏人權保護」問題。那麼，究竟中共社會有沒有人權概念與保護制度呢？

首先，我們先要確定的是中國式人權觀念與西方式人權觀念解釋的不同。換句話說，基本上詞彙解釋及理解的範圍亦不同。如對於「人民」、「國民」便顯然有不同的解釋與理解。

另外，中共的人權觀念基本上等於「生存權」的範圍，然而西方世界顯然不是，他們的理解範圍包括宗教開放、言論自由、各種福利制度等等。

嚴格而言，共產主義本質是經濟，並不是權力鬥爭問題。實際上，過去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意識型態的對立皆為經濟問題解決的手段、工具而已。

在西方學者批評中國大陸的人權方面，他們顯然根據他們的憲法來解釋亦是相對

註④ 蒙藏委員會編印，蒙藏現況雙月報，第十一卷第六期，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頁二七～二九。



有道理的。然而，根據國際法來衡量中共的人權問題是否需要檢討，吾人覺得前提條件是應相互承認相對的憲法標準。

資本主義國家從人性的角度來解釋。那麼，是否共產主義不足之處即等於資本主義的優點。我們可能需要另一個視野空間。因為，在學術界一直存有用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現象的爭議。同理，西方的精神價值體系來衡量中國的人權概念是否難以解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此，每一個人的衡量標準不同。

「西藏獨立」或「西藏地位」態度而言，達賴一向堅持的推動力在於尋求國際社會及輿論的支持。

無疑的是，在這方面達賴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八〇年代末期，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事隔多年達賴光芒不若前些年，但是尋求國際支持，仍是個有效將西藏問題保持見光度及拉昇其國際化的方法。因此加強文宣將會是達賴方面對外的重點工作之一。此外，爭取各國或組織支持的工作亦仍持續，一些人權團體，反中共政權的國家，中國境內爭取獨立的各民族或台灣台獨主張團體仍將是其訴求爭取支持的對象。不過，在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達賴國際聲望如日中天時，無法透過國際社會的壓力，達到他所希望和中共的談判的目的。而今若達賴或其政府依舊堅持其政治立場，仍想藉國際社會或輿論力量，影響中共與之舉行的談判，相信此希望將比過去更渺茫。

過去，中共一受到達賴利用媒體影響中共國家形象時，中共的文宣機構只得迎戰消毒。因此而有西藏人權白皮書等等有系統的文宣品出爐。近年來中共採取積極出擊方式，在各國舉辦「西藏文化週」、藏學家以學術交流方式出國訪問及舉行座談、邀請外國政要、媒體人訪問西藏等等，此無非是想提供有關西藏的正面資訊以抗衡達賴方面的說詞。中共與達賴的輿論爭戰相信會繼續展開。因為二〇〇八年中共將主辦奧運會，其國際形象的維護會比處理西藏問題更重要。

中共如此開放的、積極的、主動的思考轉變與動作，我們如何解讀與分析？

吾人覺得，西藏問題取決於未來中共政治領袖的問題。如，胡錦濤一九八九年在西藏實施了一連串的鎮壓和宣布西藏戒嚴，有人認為那不是他的決定，他只是貫徹中央政策；也有人認為，胡比江澤民更年輕，且更開明，中國可能會逐步開放及民主化，對解決西藏問題更有信心。

再者，西藏流亡政府的領導人寄望胡錦濤為首的新領導階層，希望他們改變以往的強硬路線，引入「建設性的變化」。

其實，西藏流亡政府與外界媒體預測將來中共新的領導是否會改變治藏政策，則是完全不瞭解中共行為的一廂情願的看法。皆是希望與預測而已。

易言之，中共政權本質沒有改變。這是牽涉到中共政權體制與黨內民主化的問題。

依中共政權的性格和集體領導的政治文化，在原則上恐怕很難改變或有讓步的可能性。然而在處理西藏問題上，也許會轉趨靈活彈性。

* * *



A Study On China's Attitude Toward Tibetan Independence

Hyuk-joo Sim

Abstract

The issues regarding Tibet's political status, independence, and future development have been constantly covered by mass media and have attracted tremendous scholarly attention. However, no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regarding the issues.

The paper purports to study different theories and perspective from scholars and experts in China, Taiwan,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author also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factors behind China and the Dalai Lama's shifting strategies. Why did they apply different strategies? What were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The paper also demonstrates why China's Tibet independence remains intact.

The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wo periods from 1950 to 1980s, and from 1989 to 2002.

It is a fact that China now controls Tibet and China has received acknowledgement of it from other countries. While gaining the upper hand, China will not discuss the issue of Tibet's status with the Dalai Lama on an equal footing. For China, issues regarding Tibet are internal problems with China's sovereignty.

Nevertheless, China's present confidence depends on maintaining its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current leadership must remain stable for at least ten years i.e., This time period would allow for the passing of the 14th Dalai Lama and for the next Dalai Lama to mature. If major changes in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or leadership occur, then China's current Tibet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could completely fail.

Keywords: Chinese government; Dalai Lama; Tibetan Independence; Tibet's Status; Tibetan Autonomy



參考文獻

- 〈中共對達賴喇嘛的「五條方針」〉，摘自西藏流亡政府中文網站，全文內容：<http://www.xizang-zhiye.org/b5/hhdl/shengming.html>
- 〈在歐洲會議的演說詞〉（1988），全文內容：<http://www.xizang-zhiye.org/b5/hhdl/yanshuo.html>
- 〈西藏流亡政府舉行紀念西藏民主日活動〉，全文內容：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網站 <http://www.tibet.org.tw/hotnews/hotnews-101.htm>
- 林照真（2000），《最後的達賴喇嘛》，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50。
- 直云邊吉（2000），《達賴喇嘛—分裂者的流亡生涯》，北京：南海出版社，2-3。
- 蒙藏委員會（2000），《蒙藏現況雙月報》，11：6，11，35。
- 梅·戈爾斯坦（1994），《喇嘛王國的覆滅》，北京：時事出版社。
- 孫克信（1995），《西藏之昨天與今天》，台北：宋氏照遠出版社。
- 楊公素（2002），《當代中國外交理論與實踐（1949-2001）》，北京：勵志出版社。
- 楊公素（1992），《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 楊開煌（1994），《談判策略研究》，台北：冠志出版社。
- 葛公尚（1995），《當代政治與民族問題》，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華子（2002），「復評達賴喇嘛與中央政府的談判問題」，北京：《中國西藏》第一期。
- 楊公素（1991），「執行『關於西藏和平解放辦法的協議』中第十四條中央統一對外規定的經過」，北京：《中國藏學》季刊，14。
- 楊開煌（1999），「後冷戰時期中共與達賴互動之研究—對話理論之分析」，《中共研究》，33：7。
- 楊開煌（1985），「從『現代化的變遷』論中共對西藏宗教文化的摧殘」，《西藏現況研究》第三輯，台北：蒙藏委員會。
- 〈達賴喇嘛聲明〉（1993），全文內容：<http://www.xizang-zhiye.org/b5/hhdl/shengming.html>
- Melvyn C. Goldstein (1989),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9-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 (1987), "The Status of Tibet History, Right, and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Law,"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Korea Times, October 31, 2000, <http://www.koreatimes.com.kr>

